



*XiBu MinZu PinKun DiQu
NongHu ChuangXin XingWei YanJi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70763012)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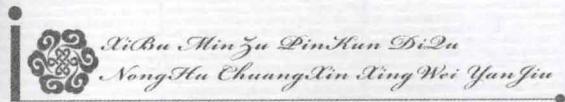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 农户创新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省的案例分析

李学术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70763012)成果

西部 民族贫困地区 农户创新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省的案例分析

李学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研究——基于云南省的
案例分析 / 李学术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141 - 0727 - 2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民族地区：不发达地
区 - 农村经济发展 - 研究 - 云南省 IV. ①F327.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879 号

责任编辑：张 频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李 鹏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省的案例分析

李学术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8.75 印张 380000 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727 - 2 定价：3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1.2 重要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3
1.3 关于贫困农户创新行为的研究述评	4
1.4 本书总体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
第2章 农户决策与贫困经济理论回顾	20
2.1 行为经济学理论.....	20
2.2 农户经济与农户决策行为理论.....	25
2.3 贫困经济学理论.....	29
第3章 文献综述：创新理论与创新测度方法	37
3.1 引言.....	37
3.2 创新理论的发展脉络.....	37
3.3 创新与发展（增长）理论	41
3.4 创新与追赶理论.....	48
3.5 创新测度理论与方法.....	50
第4章 农户创新与缓解贫困：对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75
4.1 农户创新：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问题.....	75
4.2 农户创新行为概念的探讨.....	77

4.3 农户创新的基本类型：他们能做什么	92
4.4 贫困农户可否成为创新的主体	102
4.5 普遍意义的农户创新能否自然发生	105
4.6 总结	106
第5章 案例分析：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频度 及其收入效应	107
5.1 来自民族村寨调查的发现	107
5.2 理论假设的提出	109
5.3 关于案例分析的一点说明	110
5.4 案例一：云南省××县××乡××村	111
5.5 案例二：地氟病悲剧	117
5.6 小结	122
第6章 计量分析：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频度 及其收入效应	123
6.1 前言	123
6.2 已有研究的评价	124
6.3 农户创新的收入效应（一） ——基于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125
6.4 农户创新的收入效应（二） ——基于云南省微观调查数据的 计量分析	132
6.5 结论与政策含义	142
第7章 创新缘何不足：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制约 因素理论分析	145
7.1 引言	145
7.2 分析框架	146
7.3 自然地理与环境因素	148

目 录

7.4 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	156
7.5 经济发展因素	171
7.6 制度环境与创新政策	179
7.7 总结	186

目
录

第 8 章 创新缘何不足：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 制约因素计量分析 188

8.1 调研方法与数据说明	188
8.2 农户创新程度评价	191
8.3 地理环境对农户创新资源影响的实证分析	198
8.4 社会与文化对农户创新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203
8.5 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对农户创新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214
8.6 小结	223

第 9 章 基于创新视角对传统贫困理论的重新认识与拓展 224

9.1 基于资源与环境视角的贫困理论：资源禀赋论	225
9.2 基于经济视角的贫困理论	228
9.3 基于社会视角的贫困理论	247
9.4 多视角的网状陷阱理论	253
9.5 对其他理论的评价	254
9.6 基于创新视角对贫困经济学理论的拓展	255

第 10 章 主要研究结论 258

10.1 对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258
10.2 关于贫困生成与农户创新的关系	261
10.3 关于影响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和机理	263
10.4 基于创新视角对传统贫困理论的再认识以及理论拓展	264

第 11 章 政策建议	267
11.1 提高认识，将农村创新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	267
11.2 导入全面创新的最新理念，实现农村创新政策的战略转型	268
11.3 整合城乡创新资源，实施城乡协同创新	269
11.4 培育贫困地区的“潜在创新领袖”	270
11.5 大力扶持和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组织，为农户的创新活动提供 全面服务	272
11.6 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农村产业集群	273
11.7 培育创新型文化，营造创新氛围	273
第 12 章 突破口的选择：强化知识参与，推动协同创新， 发展创意经济	275
12.1 关于农村创意经济的理论内涵	275
12.2 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想形态	276
12.3 “协同创新”是实施农村创意经济的最佳模式	277
12.4 强化知识参与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	280
12.5 基本思路、合作内容与方式	282
12.6 配套措施与政策建议	284
12.7 可行性分析	285
主要参考文献	287
致 谢	295

第1章

导 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从熊彼特开始，创新就已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迄今为止，创新已经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变量。世界各国的发展变迁亦已证明，创新既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决定一个民族贫富兴衰的关键力量。然而，在现有的贫困理论中，创新似乎还未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认为，由于忽视了创新的主导作用，贫困经济学的发展尚有很大潜力。

如果人类财富主要源于人类自身的创造，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贫困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创新的力量，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为此，我们试图将创新变量引入贫困经济学：从经济主体—贫困农户的创新行为角度寻求贫困的根源，并发现其行为规律，进而为人类最终战胜贫困做出贡献。

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迄今为止，我国的反贫困走过的主要还是一条“外源推动式”的道路。虽然变“输血”为“造血”也是我们扶贫开发战略的题中之意，但由于忽略了对经济主体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创业精神的培育，扶贫开发的内源发展潜力必然是有限的。近年来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所遭遇的“边际收益递减”甚至“贫困反弹”现象似乎可以在此得到部分解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民族贫困地区最终走出贫困提供又一次大好机遇。但在行动上，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外部环境的改善显然占据了此类地区政策实践的主导地位。虽然“培育新型农民”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其中的核心要素—农户创新一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笔者认为，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也是最可持续的力量。尽快消除那些制约发展的外部因素可能是当务之急，但后进地区要走出贫困的陷阱，最终必须依靠

自己的创造力。因此，激发农户的创新热情、培育他们的创新能力应该成为政府当务之急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单纯外源性的帮助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负面效应（笔者称之为“逆向激励”），而农户哪怕是点滴的创新，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令人惊讶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宏观层面上，结果同样会令人惊喜。

我国的反贫困战略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民族地区依然面临经济贫困、生态脆弱、人力资本匮乏、社会发展滞后等多重约束。如果单纯依靠传统的要素投入，或一味模仿发达地区的经验做法，势必落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走出贫困已属不易，实现赶超更是难上加难。笔者的初步认识是，创新不足是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创新培育则是走出贫困陷阱、实现后来居上的唯一希望。

事实上，细心观察，许多贫困地区的资源并不匮乏。以云南为例，笔者实地调查发现，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并不多见，而文化、生态、生境“三多并存”才是云南的基本省情（郭家骥，2004）。贫困也许不应该发生，至少不应如此深度发生（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其称之为“富饶的贫困”）。如果经济主体自身具备了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里可能孕育着无限的发展潜能。

因此，要走出贫困陷阱，环境固然重要。在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努力下，条件也正在改善。但农村经济要获得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条件要获得根本改善，离开了经济主体——农户其创新将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3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时代的最强音。笔者坚信，在贫困理论中，不能没有创新的位置；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创新不应被忽视；民族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更是应该依靠创新的力量。

另外，对于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许多专家将其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此，笔者表示认同，但同时也注意到，从文化角度出发去解决发展问题在实践中往往会面临难以取得认同甚至遭遇抵触情绪、政府缺乏有力的工作抓手等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而在解决创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中的文化瓶颈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的创新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努力发现贫困农户的创新行为特征规律，以期为此类地区的农村创新政策、贫困缓解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在对贫困农户的创新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期望对贫困经济学理论以及正在兴起的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以上，既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本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1.2 重要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1.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1. 农户

农户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组织，也是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不同学者对农户有不同的理解。综合现有理论界的各种观点，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特点，本书对其界定如下：农户是居住在农村，拥有剩余控制权，以家庭契约关系为基础，家庭劳动力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组织。在本书的农户概念中，并不强调其“职业以从事农业为主”，因为农户的创新行为经常是可以跨行业的，其职业也是可以转换的；也并不认为农户的政治地位低下，因为伴随着国家的体制改革，农民同样可以而且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①。

2. 创新

对于“创新”，虽然相关理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但理论界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这与创新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不同学者研究的侧面与角度不同有关。对于这些不同的认识，将在本书4.2节中加以详细评述。在这里，先给出我们的创新概念：笔者认为，行为主体任何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传统或现有做法的改变，都属于创新的范畴。这里的“具有进步意义”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或生活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对传统做法的改变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或者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例如，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从事非法交易等活动，即便可能与传统做法不同，但也不应算做“创新”。由于农户具有生产经营主体和生活消费主体的双重身份，创新活动在其生产、生活领域^②都会发生。但是，本书将主要讨论生产领域中的农户创新。

^① 史清华（1999）认为农户的概念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对户的职业划分，农户是从事农业为主的户，它的对立面是工业、运输业、商业等非农业户；二是对户的经济区位划分，农户是居住在农区的户，他的对立面是城市或城镇户；三是对户的政治地位和身份的划分，农户是一些不享受国家任何福利待遇的户，其政治地位相对低下。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符合传统社会农户的特征，但与本课题的一些理念不甚相符。

^② 生活中的创新活动也大量存在，例如，新型能源技术、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采用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在云贵川地区，由于生活用煤氟含量很高，地氟病高度流行，而少数农户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卫生习惯和改进自己的炉灶减少对自己健康的危害。

1.2.2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书以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的创新行为为研究对象。对此界定，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上述对创新概念的界定，农户的创新可以分为生产领域的创新和生活领域的创新，我们的研究将以前者为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生产经营是创造财富的基本途径，此一领域的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困而言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二是对生产领域的创新而言，现有理论基础较为扎实，资料亦比较容易取得。当然，对于生活领域的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农户（既是生产主体又是生活主体）而言，其重要性同样不可低估。但现有理论尚不成熟，缺乏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资料获取亦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将此理念提出，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旨在引起同行的关注。

第二，对中国许多问题的研究不能不考虑区域的差异性，对农户创新行为的研究同样如此。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发生的重灾区。根据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此类地区贫困的发生有着极为特殊的复杂性，对创新活动可能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影响。在西部民族地区中，云南农村可谓一个典型代表，这里几乎集合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问题，如经济问题、生态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境问题、毒品问题、健康问题等，这些因素复杂交织，共同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对农户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如果要通过对农户创新行为的研究找到战胜贫困的新武器，那么，对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云南省的研究无疑具备较高的典型性，因为，此类地区不仅有着一般地区的问题，还有一般地区所没有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对此类地区创新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指导解决本地区的问题，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实践也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3 关于贫困农户创新行为的研究述评

农户创新，国外的研究一般称为农民创新（farmer Innovation）^①。传统的看

^① 虽然农户更加强调家庭的作用，农民更多地从个体的层面考虑，但是，由于在实际的研究中，往往两者很难区分，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并不需要具体区分单个农民的行为和家庭行为，因此，在我们下面的行文中，也将两者视为等同。

法认为农业的加速发展来自于工业革命后第二产业的带动，农业的创新亦主要来源于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工作，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自身的创新活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农民参与式发展研究模式的兴起，这一现象得以改善。现有的研究在关于农户创新的动力、模式、环境等方面均有所涉猎。

1.3.1 农户创新的动力

一般而言，农户创新的终极动力来自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克彻力（W. Critchley, 1999）等以非洲为例研究了农民创新的来源、动机、农民创新者的年龄和性别，认为农民创新并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为目的的^①。在此根本动力下，农户的创新行为又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驱动。目前关于农户创新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速水佑次郎（Yuijiro Hayami）和美国的费农·拉坦（V. W. Ruttan）提出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Induced Technical Innovation），即农业技术创新产生于生产诱导，而生产诱导起因于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要素价格变动诱导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② 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以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为代表的要素稀缺诱导学说；二是以施莫克勒→格里克斯为代表的市场需求诱导学说。

借鉴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结合农民自身条件，王慧军（2003）将影响农民行为改变的动力分为三种，即原动力、拉动力和推动力。原动力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的需要，是内因；拉动力是市场需求，推动力是政策导向，这两者是外因^③。除此之外，柴浩放、左停、张庆文（2009）指出：“农民创新的动力是更加多样化的，不仅包括主观性因素，也包括客观性因素；不仅有普适性因素，还有地域性因素”。^④

^① Critchley Wrs, Cooke R., Jallow T., Laman M., Njoroge J., Nyagah V., Saint-Firmin E. 1999. Promoting Farmer Innovation: harnessing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East Africa. Relma/Undp Workshop Report 2 (131pp).

^② Hayami, Y. and V. W. , Rutt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8.

^③ 王慧军. 中国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 [D]. 东北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④ 柴浩放, 左停, 张庆文. 创新的农民与农民的创新——对一次农民奋斗创新评选结果的浅析 [J]. 农村经济, 2009 (11): 109 -112.

1.3.2 农户创新模式

现代农户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外部推动创新、参与式创新、自主创新。实践中，这三种创新模式既有单独呈现，也有交融的现象。

外部推动模式实质上就是农业技术推广和创新扩散的模式。目前，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正处于一个新的高度。如克劳德（Crowder）和安德森（Andersen）指出应将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视为一体化农业技术系统中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温·毕克（Van. Beek）提出“超越技术传递”；恩·洛林（N. Roling）提出“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科学知识体系”，进行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咨询式推广服务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推广等。高启杰（1994）认为，农业推广人员通过沟通及其他相关方式组织与教育农村居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改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采用和传播农业创新，并获得自我组织与决策能力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最终实现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村产业、繁荣农村社会的目标^①。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讨目前主要集中在关于各种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体系、机制建构及人员参与方面，和以往研究相比，凸显了农户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这种模式下的农户仍然只是对政府推广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被动应用，属于外源型的创新，自主创新的原动力较弱，其创新的程度也比较浅。

参与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农户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技术应用的终极用户——农民的参与，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挖掘动员“乡土资源”。罗杰斯（Rogers, 1983）认为农民在采用新技术之前，往往自己会进行试验^②，华纳（Warner, 1974）、斯通曼（Stoneman, 1981）、来勒和斯梅尔（Leather and Smale, 1991）发现农民根据自己和邻居引进新技术的表现情况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技术，在边干边学中实现新技术由科学家的实验室向农民田间的转移。在中国，李小云^③（2001）、左停^④（2003）、高启杰^⑤（2004）等介绍引进了参与式创新模式，提出在农业技术创新

① 高启杰. 农业推广模式研究 [M]. 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12.

②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③ 李小云. 参与式发展概论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10-24.

④ 左停，齐顾波，钟兵仿. 农民参与式技术发展以及其中一些问题的讨论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3 (01).

⑤ 高启杰. 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参与 [J]. 古今农业, 2004 (04).

中注重农民的作用，并对参与式方法的实践进行了跟踪研究。更进一步，高启杰认为在许多农业技术发展过程中，农民常常是主角，而外部人员主要是起一种支持、协助和促进作用^①。总的看来，农民参与理论的研究视角是从专业或机构研究人员的角度出发，视农民参与为有效的技术扩散和创新途径（Chambers, 1994a; 1994b; 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 1991; Cox et. al. , 1996; Rhoades, 1997）。虽然参与模式更加强调农民的参与，也提倡发挥农民的主动性，但农民仍扮演一个在专业研究人员主导的工作中参与者的角色。这种模式中外源性推动力和拉动力仍发挥主要作用，原动力有所发挥，但没成为最主要的动力。这种模式亦还未真正把农户看成创新主体。

自主创新模式是一种使农户真正成为创新主体的模式。在现有的研究中自主创新模式有三种思路。第一种可称为乡土性创新模式。目前，这一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乡土性技术创新以乡土知识和本地化经验为基础。关于乡土知识，沃伦（Warren, 1991 年）认为它是某一个社会对于交流沟通和做决策的信息基础，而且乡土知识信息系统是动态和变化的，它不断地受到内部的创新与试验以及外部知识系统的影响^②。弗莱威尔（Flavier, 1995）等认为乡土知识是人们长期的经验总结，它是由某个特定社区所享有（本土性）；它能适应于当地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梁烨、赵志铭，2006）。因此，乡土性技术创新具有区域适应性，实用性很强，对其他农户的说服力也很强，具有现实的示范意义，创新后能得到迅速推广，并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杨丽（2009）、傅海霞（2010）将乡土性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理论相结合，描绘了乡土性技术创新发展壮大的图景，提出了促进乡土性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第二种自主创新模式是创业模式。农民创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特有现象，易修平（2000）、王东京（2003）、温锐（2004）强调了农民创业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如何引导帮助农民进城创业的问题；张敏杰（1996）、黄中伟（2004）探讨了农民创业的动力及创业过程的心理变化问题；严文清等（1996）、曹卫秋等（2000）、方凯等（2003）则通过对农民创业现状和阶段的调查研究，提出如何帮助和促进农民创业。除了以上两种自主创新的思路外，第三种是应小丽（2008）研究了农户的自主行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她将这类创新行为称为“创新

① 高启杰. 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参与 [J]. 古今农业, 2004 (04).

② Warren: 1992c Us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Concept Paper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Utility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Resource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s, Ames, Iowa; Center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性自主行为”。“所谓创新性自主行为主要是指人们基于生存和利益需要，在既有制度安排与约束条件下，人们既正视制度的限制又突破制度的障碍，能够推动制度变迁的一种创新行为。”^① 其实，这种创新性自主行为不仅体现在制度变迁方面，且在市场营销^②、组织创新^③等方面都能看到这种创新。以上三种创新方式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了农户的原动力作用，强调了农户作为创新主体的存在形式。

1.3.3 农户创新的环境

农户实施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等创新行为时，一方面要受到具体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某些环境条件会成为引发农户创新的动力，农户通过改变环境而实现创新，创新成为农户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艾利斯（Ellis, 1998）和卡他（A. K. Cupta, 1988, 1990, 1992, 2000）探讨了农民创新的环境因素^④。吴斌、茯苓和莫德森（Bin Wu, Flynn A & Merdseen T）探讨了农民创新的组织条件和机制、影响农民创新能力和组织形式的因素，以及农民的组织模式和家庭创新能力的关系、农民的信息沟通网络（社会资本）和家庭创新能力的关系。克里斯（Chris Reij），安·沃特-贝勒（Ann Waters-Bayer）认为农民在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创新在资源贫乏、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农民为了生存除了创新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还探讨了农民创新的链条，认为创新会引发更多地创新。费提恩阿拜（Fetien Abay），米题库海勒（Mitiku Haile）和安·沃特-贝勒（Ann Waters-Bayer）认为环境因素使贫困小农的创新比富裕农民的创新能更集约地使用资源。安妮克·卡他（Anil K. Cupta, 1991, 1998, 2007）认为需要加强农民创新者之间的知识网络以激励更多的创造性努力来以一种可持续地方式解决地区问题。潘塔（Pan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非正式体制，农民、土著药

① 应小丽. 农民的自主行为与制度变迁——以 1952~1992 年浙江为例 [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0 (06): 1.

② 陈冰儿. 农民创新营销——市民购米包地 [J]. 农民文摘, 2007 (03): 40.

③ Bin Wu; Farmer Self-Organizing Innovation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China: A Study of Farme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Zhidan, Loess Plateau [J].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2002, 30 (1): 42-63.

④ 杨丽: 乡土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J].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09): 26.

草栽培者等在很多领域都进行了极具价值的创新^①。

叶敬忠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农民创新行为。他将农民划分成“创新农民”与“非创新农民”，认为导致社区内“创新农民”与“非创新农民”的区别不在于农民拥有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区别，而在于社会资本的区别^②。胡虹文认为：对于农业技术创新，除与外界的信息传递与交换，以及农业技术创新实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要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效果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自然环境；（2）社会政治制度；（3）意识形态；（4）宗教观念及宗教活动；（5）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及偏好；（6）政府行为等。^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应小丽认为：“自然条件、工商习俗、事功文化等地方性知识，以及地方政府的意志与行为取向是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④

上述研究，不仅认识到了环境对农户创新的重要性，也分析了各种不同环境对农户创新的影响，但尚需对各类环境作用做进一步分析和具体探讨，特别是对不同环境、不同约束条件和农户创新行为之间相关关系的深入研究。

1.3.4 现有研究的不足

总的来讲，虽然现有文献对农户的创新行为从动机、环境、模式等方面已有不少涉猎，这些研究对我们全面而深入研究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的创新行为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素材，在方法和结论上也富有启发意义。但结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就会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专门针对我国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展。

中国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除了面临中国其他地区农民的一般问题之外，还受到异常严酷的自然条件、极为特殊的社会、文化、民族、宗教乃至边境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此类地区贫

^① Pant, K. P.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Protect Farmers' Rights in Nepal [J].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nsultation Meeting of Farmers' Rights Programme. Kathmandu, Nepal. 2002.

^② 叶敬忠. 创造变化的空间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4 (04), 叶敬忠. 农民发展创新中的社会网络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 (09).

^③ 胡虹文. 农业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D]. 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04 (01), 58 - 59.

^④ 应小丽. 农民的自主行为与制度变迁——以 1952 ~ 1992 年浙江为例 [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0 (06): 1.

困农户的创新行为可能有着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规律。但笔者注意到，时至今日，专门针对中国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创新行为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展，而专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难以替代的，因为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最为活跃和最具决定意义的关键力量，种种问题复杂交织的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崛起更要依赖创新的力量；虽然此类地区的农户面临种种制约；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农村创新的基本力量（此类地区很少有企业）；创新行为的发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一旦掌握这一规律并且成功用于指导农户生产、生活实践，创新可能就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崛起也许就会指日可待；笔者认为，后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创新政策走“内源式”发展道路，而对农户创新行为的专门研究将是制定农村创新政策的必要前提。

第二，迄今为止，针对贫困农户创新行为的研究基本尚未摆脱“技术”的窠臼。

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与农户创新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创新领域，主要包括对农业技术研发、扩散或推广、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乡土性技术创新等方面。“技术”的创新自然也是农户创新的重要内容，但早从熊彼特开始，创新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几十年来，创新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对创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其中近年来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变就是“非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葛霆、周华东，2007）^①。在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署（Eurostat）联合出版的、指导欧盟成员国测度科技与创新活动、收集和解释创新数据的指导性文件《奥斯陆手册》（第三版）中，创新调查的内容也在原来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基础上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因此，仅仅关注技术创新已经不符合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理念。更加重要的是，虽然新技术被大多数学者、政府乃至农民寄予厚望，但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业新技术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有的研究表明，农业新技术对增加农民收入进而缓解农村的贫困具有良好的效果。如，阿贾磊艾琳 Arega D. Alene (2006)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1981~2005年间，由于玉米新品种的广泛采用，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而走出贫困人口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稳步上升，而从90年代开始每年达到100万人以上，同时玉米研发投入回报率也高

^① 葛霆，周华东. 国际创新理论的七大进展 [J]. 战略与决策研究, 2007 (12).